

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考论*

杨 雨 蕾

内容摘要: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包括 1 幅中国总图,15 幅分省地图以及 1 幅朝鲜半岛、日本、辽东合图等 17 幅地图和相关文字说明,并附有经纬度列表、索引等,1655 年首先以拉丁文本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之后陆续出版德文本、荷兰文本、法文本和西班牙文本,各语种文本还存在不同的版本。这部地图集不少内容直接参考《广舆记》等中文文献资料,除了对中国地理状况的整体描述,还有对每个省的说明。卫氏在此书中一方面对相关内容采用西方制图法重新加以编绘和说明,另一方面也融合了西方人大航海以来的地理发现和自己在一些地区的实地考察。《中国新地图集》纠正了之前西方人不少模糊和错误的认识,不仅较好地把握了中国作为一个地理单元整体所具有的特征,而且具体到中国内部不同区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特点,反映出卫匡国对中国地理认识的广度和深度。直到 19 世纪初,西方对中国地理的认识还深受这部著作的影响。

关键词:卫匡国 《中国新地图集》 中国地理认知 西方汉学

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S. J.)字济泰,1614 年 9 月 20 日出生于意大利特兰托(Trento),1632 年加入耶稣会,之后便被派往中国传教。1640 年 3 月他乘船从葡萄牙里斯本出发,一路历经艰险,1642 年 8 月到达澳门,1643 年 10 月到达杭州。之后游历江南诸多地方,并亲历明清交替之战事。1650 年他被任命为杭州地区耶稣会会长,1653 年作为天主教耶稣会中国副教省代理人回到欧洲,前往罗马教廷为中国礼仪辩护。1659 年重返杭州,1661 年 6

* 本文为德国科学基金会(DFG)项目“Translating Terrains: East Asia between Autochthonous and European Cartographic Languages”研究成果,部分完成于 2019 年在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MPIWG)客座研究期间。

月6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遗体即被安葬在杭州城外大方井天主教徒墓地^①。

作为明清交替之际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卫匡国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卓越贡献。他努力学习中文,广泛阅读中国典籍,悉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和文化。他尊重中国风俗,了解中国儒家传统,正是在他的积极辩护下,利玛窦适应性传教策略得以在清初持续推行。卫匡国有关中国的著作包括《汉语语法》(*Grammatica Sinica*)、《鞑靼战记》(*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中国新地图集》(*Novus Atlas Sinensis*)、《中国历史第一部十卷:从人类诞生到基督降世的远方亚洲,即中华大帝国周邻记事》(*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 Res a gentis origine ad Christum natum in extrema Asia, sive Magno Sinarum Imperioge tascomplexa*)等多部,最初都以拉丁文撰写。其中这部《中国新地图集》包括17幅地图,每幅图后并附有说明文字。地图通过部分实际测量和相关资料数据,以西方制图法绘制,同时结合说明文字,在当时较为详细和准确地向西方介绍中国地理。直到19世纪初,西方对中国地理的认识还深受该著的影响,卫匡国也因此被称为西方的“中国地理学之父”。

为了纪念这位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杰出贡献的意大利人,位于卫匡国出生地的意大利特兰托大学(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Trento)于1997年成立卫匡国研究中心。该中心旨在促进中意、中欧以及东亚与欧洲之间的文化、科研交流,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即为翻译和编辑出版《卫匡国全集》,《中国新地图集》是其中的第3卷,共上、下两册。该意大利文本由已故罗马大学教授、汉学家白佐良(Bertuccioli Giuliano)翻译,并有详细注释说明,2002年特兰托大学出版,其原本为1655年版《中国新地图集》拉丁文本。2003年,卫匡国研究中心又以原有尺寸(纵长49cm,横宽68cm)影印出版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17张地图。近年,包括《中国新地图集》在内的《卫匡国全集》前三卷在浙江大学和特兰托大学近5年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中意建交50周年之际由意大利文翻译成中文,即将出版^②。笔者因受托承担组织《中国新地图集》中文译本的学术校对工作,故较早阅读到全部中文译稿。近年在欧洲访学期间又见到该地图集部分原刻本。本文即以中文译稿为基础,参照相关研究成果,就《中国新地图集》的版本、内容、文献来源以及影响做较为概观性的考论。

①有关卫匡国的生平存在不同观点,此处主要参见[意]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卫匡国生平及其著作》,张西平等主编:《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卫匡国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40页。

②《中国新地图集》为第三卷,译者是瞿姗姗和王蕾蕾。

一、《中国新地图集》的出版

《中国新地图集》的出版是在卫匡国作为耶稣会中国副教省代理人返回欧洲期间,当时安特卫普(Antwerpen)、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是欧洲制作地图的重要城市,拥有十分先进的印刷设备。卫匡国在回到欧洲不久就前往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并最终将地图集的出版权交给阿姆斯特丹出版商让·布劳(Joan Blaeu, 1596-1673)。地图集的拉丁文手稿当在1654年1月之前已经完成,根据要求,修士们出版书籍必须提出申请,3月卫匡国得到教会许可。1655年1月卫匡国的授权出版获得罗马帝国官方许可,让·布劳及其继承者拥有15年的独家版权;3月比利时总督府颁布特权证明,授予让·布劳家族20年的版权;5月,荷兰总督府也签署此授权书^①。

1655年《中国新地图集》首先以拉丁文本由让·布劳出版于阿姆斯特丹,根据罗马帝国的特权许可证证的内容,可知地图集是作为《大地图集》(*Atlantis Maior*)的第6部分出版。这个所谓大地图集就是让·布劳和威廉姆·布劳(Willem Blaeu, 1571-1638)父子1635年开始出版的《新地图集》(*Novus Atlas*)。布劳父子出版的地图集最早出现在1630年,该版共包括地图60幅,有些是原创的,有些是印自威廉姆·布劳一年前从洪第乌斯(Jodocus Hondius)购得的;1631年印制了扩大版。1635年出版了2卷更大规模的地图集,包括208幅地图,名为《新地图集》(*Novus Atlas*),又名《舞台》(*Theatrum*)或《世界舞台》(*Theatrum Orbis Terrarum*);1640年扩大为3卷;之后印刷的地图不断增加,直到1655年扩展为6卷^②,此第6卷即《中国新地图集》。根据惠泽霖(H. Verhaeren)神父1949年《北堂书目》(*Catalogue of the Pei-T'ang Library*)可知,国内原北京西什库教堂图书馆即藏有此版《新地图集》^③。

①参见书前相关许可证和授权书以及[意]布莱森(Bressan, Luigi):《〈中国新地图集〉的出版商让·布劳(Joan Blaeu)》,张西平等主编:《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卫匡国研究》,第174-175页。

②Short, John Rennie, *The world through maps: a history of cartography*, Tronto: Frefly Books, 2003, pp. 130-131.

③北京遣使会编:《北堂图书馆藏西文善本目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641列,第2202条。

除了拉丁文本,现可知1655年还出版有德文本^①,1656年出版了荷兰文本、法文本,1658-1659年出版了西班牙文本,其中法文本在1663年和1667年又有重印^②。上述语种,除了西班牙文本,其他均存在单独出版以及作为《新地图集》第6卷出版两种情况。两种情况从作为插图的书名页上可以加以区别,即两张插图不同,图上刻印的书名内容也略有所不同。作为《新地图集》第6卷出版的插图,主体是人字顶的拱门建筑。拱门被一位米开朗基罗式的壮年男子向内打开,“clausa recludo”(意为“解除锁定”)之语出自男子口中,书名和作者等内容刻印在打开的门上^③,同时界于拱门和人字顶之间较宽的门楣上也凸板印刷有该卷的书名等。门外的景象是蜿蜒在山体之上的长城,还绘有湖泊和远方的城市。大门前陆地上有七个小天使进行着测量绘图工作的景象,他们手中的地图就是该书中国总图的轮廓,地球仪展现的也是东半球的那一面。

单独出版的地图集中的插图,上半部是天,下半部是地,天地之间绘出厚重的城墙。下半部分所绘制的拱门、壮年男子以及小天使等和前述作为大地图集第6卷中的插图基本相同,拉丁文书名和作者同样写在打开的门上,内容与前略有不同^④,门外则是另一片空旷山野景象。图的上半部分,绘出圣母以及接受圣母光辉的诸多小天使,左上角是闪耀的耶稣会徽标,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宗教意义。需要说明的是,刻印在门上的内容虽然都出现有

①Verhaeren, H., A German Edition of Fr. Martini's "Novus Atlas Sinensis", *Monumenta Serica*, Vol. 12(1947), pp. 260-265. 不过克劳特(Peter van der Krogt)的版本说明将德文版的出版时间标注为1656年(Peter van der Krogt, *Koeman's Atlantes Neerlandici*, vol. 2, 't Got-Houten: HES & DE GRAAF, 2000, p. 311)。

②出版年根据意大利特伦多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说明。徐明德指出该地图集曾被译成9种欧洲文字,不知何据(徐明德:《论意大利汉学家卫匡国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卓越功绩》,载德马尔基(Demarchi, Franco)、施礼嘉(Scartezzini, Riccardo)编:《卫匡国:一位在十七世纪中国的人文学家和科学家》,意大利特兰托大学,1996年,第30页)。又,克劳特的版本说明则将荷兰文本和最早法文本的出版时间标注为1655年(Peter van der Krogt, *Koeman's Atlantes Neerlandici*, vol. 2, p. 305, 309)。

③NOVVS | ATLAS | SINENSIS, | A | MARTINO | MARTINIO | Soc. Iesu | DESCRIPTVS | ET | SERENISSIMO | ARCHIDVCI | LEOPOLDO | GVILIELMO | AVSTRIACO | DEDICATVS. | [-] | Cum privilegio S. C. Maj. | et Ordd. Foed. Belg.

④NOVVS | ATLAS | SINENSIS, | A | MARTINO | MARTINIO | Soc. Iesu | DESCRIPTVS | ET | SERENISSIMO | ARCHIDVCI | LEOPOLDO | GVILIELMO | AVSTRIACO | DEDICATVS. | [-] | Cum privilegio S. C. Maj.

拉丁文的地图集名称和作者,但是没有出现出版商名称,而地图集内其他地方也没有标注出版商信息,如此导致有些图书馆没有将所收藏的这部单独出版的中国地图集看作是布劳出版的一部地图集^①。布莱桑曾说这些文本除了1663年和1667年法文本有说明该地图集列入布劳《新地图集》第6卷,其他文本对此似乎并没有提及^②,应当是所见文本为单独出版的地图集导致出现的错误认识。笔者曾查阅藏于德国奥斯特公爵图书馆的1655年拉丁文藏本,即为列入《新地图集》第6卷本。此后,让·布劳1663-1672年主持出版一部新的地图集,共包括近594幅地图,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地图集,即《大地图集》(*Atlas Maior*)。《大地图集》拉丁文本共11卷,另外有法文本(12卷)、荷兰文本(9卷)、德文本(10卷)、西班牙文本(10卷)。拉丁文本中,《中国新地图集》被收录在第10卷^③。

上述5个语种《中国新地图集》的具体版本情况,克劳特(Peter van der Krogt)在其《科曼的荷兰出版的地图集》(*Koeman's Atlantes Neerlandici*)中主要对不同版本的版页进行了颇为详细的说明^④。根据他所列出的版本,不考虑前述单独出版,或作为《新地图集》第6卷出版的情况,拉丁文本有1655年初版、修改版、重排版以及1662年版共4个版本,除了正文前卫匡国的呈文和出版许可证等所安排的包括正反页在内的页数各存在一些不同,正文和经纬度列表(*Catalogus Longitudinum ac Latitudinem*)、索引(*Index Rerum*)、契丹王国附录(*De Regno Catayo Additamentum*)、《鞑靼战记》(*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的页码也各有一些不同。例如正文部分,前面两版均为171页,但这两版第10省(即浙江省)起始页码有不同,分别为第108页和第109页;而后两版的页数则分别为134页和154页。其他语种,法文本有1655年、1663年(1667年同版)两个版本,每一部分的版页都有些不同;荷兰文本、德文本和西班牙文本则只有一个版本。

地图部分,铜版刻印,同时采用了雕刻和蚀刻两种技术手段。同版,但

①Peter van der Krogt, *Koeman's Atlantes Neerlandici*, vol. 2, 't Got-Houten: HES & DE GRAAF, 2000, p. 295.

②[意]布莱桑(Bressan, Luigi):《〈中国新地图集〉的出版商让·布劳(Joan Blaeu)》,张西平等主编:《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卫匡国研究》,第175页。

③Keuning, Johanner, *Blaeu's Atlas, Imago Mundi*, vol. 14(1959), pp. 74-88; Keuning, Johannes, Willem Jansz, *Blaeu, A biography and history of his work as a cartographer and publisher*, Revised and edited by Marijke Donkersloot-de Vrij., Amsterdam: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1973.

④Peter van der Krogt, *Koeman's Atlantes Neerlandici*, vol. 2, pp. 295-317.

存在被修改的情况^①,还存在无手绘上色和有手绘上色的差别,手绘上色各藏本多有不同^②。如笔者所见哥廷根大学图书馆 1655 年拉丁文藏本,17 幅地图完全没有手绘上色。而意大利特兰托大学卫匡国研究中心影印出版的地图原本和藏于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Universidad de Granada)图书馆 1662 年版拉丁文本中的地图均有手绘上色。以“中国总图”为例,该图左上角图名外框 1655 年(影印出版)版涂以粉红色,外框装饰为黄色,1662 年版外框为蓝色,外框装饰为白色,周边所绘人物的色彩也有不同;又,图中所绘制的部分省、岛屿和周边国家等外轮廓线的涂色不同,如 1655 年版江西省和朝鲜半岛为绿色,对马岛为红色,日本本岛为黄色;而 1662 年版江西省和朝鲜半岛则为黄色,对马岛和日本本岛则为绿。笔者所见 1655 年德文本,“中国总图”上江西省为蓝绿色,朝鲜半岛为黄红相间,对马岛和日本本岛为红色。以上版本的地图集之后都有重印,流传甚广,至今在欧洲的不少图书馆除了有完整的地图集,还能看到有单幅的“中国总图”收藏。

①巴尔达齐(Baldacci, Osvaldo)指出地图铜板存在被修改的情况,即初版的各省分图没有图例说明。最明显的如云南省图中,初版左下北回归线以北原刻有“Excudebagt | JoannesBlaeu. | Cum privilegio Sacrae | Caesareae Maj”,后这些文字被擦除,所在处为图例所代替,文字的内容则被改为“Exc. Jo: Blaeu | cum privilegiis | Sac:Caes:Maj. | et | Ordinum Belgicae | Foederate”,出现在北回归线以南(Baldacci, Osvaldo, “The cartographic validity and success of Martino Martini’s Atla Sinensis”, in Melis, Giorgio (ed.), *Martino Martini: Geografo, Cartografo, Storico, Teologo: 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Trento, 1983, p. 82.)笔者迄今没有见到巴尔达齐所说的初版,所见德国哥廷根大学图书馆拉丁文藏本和德国奥斯特公爵图书馆(Herzog August Bibliothek)1655 年拉丁文藏本中的地图都已是所谓修改过的版本。林宏查阅网络上公开的 12 种扫描本,指出德国海德堡大学电子资源网站的《中国新地图集》和澳门科技大图图书馆网站的哈佛大学图书馆藏《中国新地图集》(<http://lunamap.must.edu.mo/luna/servlet/view/search?search=SUBMIT&q=martino+martini&dateRangeStart=&dateRangeEnd=&sort=date&QuickSearchA=QuickSearchA>)中,北京、南京、浙江和广东四省没有图例(林宏:《卫匡国〈中国新图志〉制图方法研究》,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后出站报告,2018 年)。又,笔者查波兰弗罗茨瓦夫大学藏本(<http://www.biblioteka-cyfrowa.pl/dlibra/doccontent?id=41233>)和卫匡国中心影印出版的 1655 年版地图,总图右下角没有所见其他图本中的如下文字:Cum privilegio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 & Ordinum Belgicae Foederate. |。

②戴闻达对所见的 6 个藏本进行了说明(Duyvendak, J. J. L., *Early Chinese Studies in Holland,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32, Livr. 5(1936), pp. 305-310)。

二、《中国新地图集》的内容

《中国新地图集》在卷首彩色插图、卫匡国呈文和出版许可等内容之后,正文主体部分除了地图,还有大篇幅的文字内容,如黄盛璋所言,这部地图其实为地图和地志合二为一之作^①,这种方式也是 16 世纪以来西方制图学的传统。地图共有 17 幅,即 1 幅中国总图,15 幅分省地图和 1 幅朝鲜半岛、日本、辽东合图。总图所绘出的地理范围东到日本岛,西到沙漠以西、西藏、孟加拉湾。15 幅分省地图即以明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为据,图幅依次为:北京或北直隶、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四川、湖广、江西、南京或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文字部分,除了最前面的对中国地理的概括描述,每一幅分省地图后面都有对该省较为详细的说明,辽东、朝鲜半岛、日本合图在正文最后,也有具体的说明内容。另外还附有经纬度列表、索引等。

17 幅地图四周有经纬度坐标体系。总图经纬刻度每度都以黑白格表现,逢 5 和 10 标出数字,并绘出网格线。纬度自南而北的刻度范围在 14-46 度,经度则有两个刻度,北部标绘在内的刻度以北京为零度经线,北部向东有 31 度,向西则 32 度有馀,标绘在外的刻度从西到东为 123-176 度,北京在 145 度经线上,这是以当时在欧洲较为通行的以福岛(加纳利群岛)为本初子午线的经度。至于分图,没有绘出经纬网格,因为比总图的比例尺大,四周的经纬刻度每度标出数字,每度之间又细分为等比例的以不同色彩相间表现的 6 格,每格即为 10 分。比例尺方面,总图没有标绘出,2003 年卫匡国研究中心影印出版的地图说明为 1:8,461,500。每幅分图则取四角出现的空白处,分别以两种标尺说明比例尺情况,一种是中国里(Stadia Sinensia)标尺,另一种是日耳曼里(Milliaria Germanica)标尺。笔者据卫匡国研究中心出版的地图说明列出每幅图的尺幅和比例尺^②,详见表 1。

表 1 地图尺幅和比例尺一览表

序号	地图	尺幅(横宽×纵长)(cm)	比例尺
1	总图	60×45.7	1:8461500
2	北京(北直隶)	48×39.6	1:1594000

①黄盛璋:《卫匡国〈中国新图志〉研究初论》,张西平等主编:《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卫匡国研究》,第 195-196 页。

②数据和高泳源所言存在较大不同,高泳源以为总图的比例尺大概为 1:18,000,000,省图一般为 1:3,000,000(高泳源:《卫匡国〈马尔蒂尼〉的〈中国新图志〉》,《自然科学史研究》第 1 卷第 4 期,1982 年,第 369 页)。

续表

序号	地图	尺幅(横宽×纵长)(cm)	比例尺
3	山西	48×39.5	1 : 1594000
4	陕西	48×39.8	1 : 2158000
5	山东	48×39.7	1 : 1833200
6	河南	49×40.5	1 : 1466000
7	四川	48×39.8	1 : 2136000
8	湖广	48×40.5	1 : 2474000
9	江西	49×39.5	1 : 1747000
10	南京(江南)	48.2×40.5	1 : 2159000
11	浙江	48×40.3	1 : 1376000
12	福建	48×40	1 : 1487000
13	广东	48×40.5	1 : 2475000
14	广西	48×40	1 : 1488000
15	贵州	48×39.2	1 : 1303000
16	云南	48×40.4	1 : 1835000
17	朝鲜半岛、日本	57×41.7	1 : 3552000

地图上的地理信息,水系特征十分明显,重要的河流标有名称,湖泊、山脉以及沙漠等较为形象的标识,各级各类行政区划有相对统一的符号区别标识。总图主要绘出明 15 省和各省所属府州,部分卫、县等也有绘出,如浙江省在 11 府之外^①,还标出隶属于湖州府的安吉(Gankie)州;贵州省除了 8 府 4 州^②,还绘出新添(Sintien)、普定(Puting)2 军民指挥使司^③以及隶属都匀府的麻哈(Maho)、独山(Toxan)两州和隶属黎平府的永从(Iungcung)县、洪(Hung)州长官司。图上省界以虚线绘出,若有手绘上色的图本则加绘彩色线条,府(州)以符号■表现,明显绘出的水体包括洞庭湖(属湖广)、鄱阳湖(属江西)、太湖(属南京)、甌社湖(即高邮湖,属南京)、巢湖(属南京)、大陆泽(属北直隶)、马湖(属四川)、洱海(属云南)以及绘于西番(Si-Fan)的加湖(Kia Lake)等。

分省图则以虚线绘出府(直隶州、军民指挥使司等)界,若是手绘上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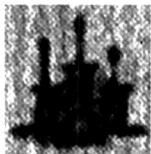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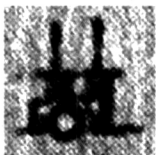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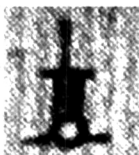
①即杭州、嘉兴、湖州、严州、金华、衢州、处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 11 府。

②即贵阳、思州、思南、镇远、石阡、铜仁、黎平、都匀 8 府和普安、永宁、镇宁、安顺 4 直隶州。

③另有平越和龙里 2 军民指挥使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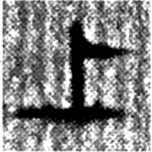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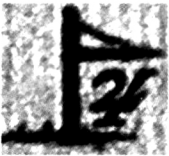
图本,则加手绘彩色线条,如此标识出县级政区(包括州、长官司、安抚司等)以及卫所、宣慰司、招讨司等,同时还以不同符号反映一些地区的矿产分布。每张分省图在四周的合适位置有图例说明,包括一些缩略词,基本统一,详见表 2^①。北直隶、江南、山东等省沿海的部分陆地绘出淤泥地状态,标明咸(salinae),以表现盐场。部分地图还有少量的文字说明。又,贵州省图还以双虚线特别绘出由湖南穿过贵阳进入云南,以及西北通往四川的道路。北直隶、陕西、浙江、福建等省的一些河流上还较为形象地绘出河上的桥梁。另外,作为传教士,卫匡国在各省地图以耶稣会徽标标绘出当时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的分布情况。

表 2 地图图例一览表

图例	拉丁文原文	中译文	实际指称或所在省
	Metropolis	省会城市	省
	Urbs	城市	府和军民府(Urbs militaris)。军民府出现在北直隶、四川、广西、贵州、云南五省。
	Civitas major	大市府	直隶州
	Civitas minor	小市府	县(州)、长官司、安抚司等。

①河南和浙江两省表现矿产分布的图例与其他省份方向相反,即旗帜和标记位于旗杆的左侧,其他省份则位于右侧。据此巴尔达齐认为这反映出地图集的铜板雕刻者应当不只是一位,这两省的雕刻者和其他省有不同(Baldacci, Osvaldo, “The cartographic validity and success of Martino Martini’s Atla Sinensis”, in Melis, Giorgio (ed.), *Martino Martini: Geografo, Cartografo, Storico, Teologo: 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Trento, 1983, p. 76)。

续表

图例	拉丁文原文	中译文	实际指称或所在省
	Fortalitia	堡塞	卫所、宣慰司、长官司、招讨司等。
	Signum militare	军事标记	部分宣慰司、宣抚司、军民指挥使司等。出现在北直隶、山西、陕西、山东、四川、广东、贵州、云南八省。
	Plumbifodinae	铅矿	出现在浙江、广东、贵州三省。
	Mercurifodinae	汞矿	出现在贵州省。
	Argentifodinae	银矿	出现在贵州、浙江、湖广、江西、广东、福建、广西、河南八省。
	Argenti vivofodinae	水银矿	出现在广西省。
	Aurifodinae	金矿	出现在贵州、北直隶、云南、浙江、山东、江西、陕西、福建、广西、河南十省。
	Stannifodinea	锡矿	出现在福建、广西、河南三省。

图例	拉丁文原文	中译文	实际指称或所在省
	Ferrifodinae	铁矿	出现在山西、福建、广西三省。
*	Cataractae	水闸	出现在北直隶。
M.	mons	山脉	
fl. F.	fluvius	河流	
A.	Amnis	流域	
L.	Lacus	湖泊	
			耶稣会会徽图标,只出现在贵州省图例中,但该省图上并没有这一标识,另云南和日本朝鲜图上也没有该标识,此三图外的其他分省图上均有。

地图上值得关注的还有标示各省图名框的装饰图案^①。大多数图幅在装饰框外还绘有人物,人物形象多少带有一些地域的特色。典型的如北直隶绘出两位端坐的官员,一边身着明代官服,一边似身着清代官服,两者身后均有拿着直柄黄伞的侍从,颇有明清帝王之都的象征意义(图见封二);陕西省除了常出现在西方装饰框边的孩童,另有一位提着大刀의武夫,具有关云长的形象,或是表现该省受到北方鞑靼人威胁,常有武力对抗之情势;山东省绘出四位男子在比划拳脚的场面,大概与此地较多“土匪强盗”有关,或为展现所谓梁山好汉;河南省绘出两位站立着的儒雅文官模样,可以反映该地作为历史时期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特点;四川省是两位并排的带有蛮族特征的男子,一位看似文官,一位则是手持大刀的武士,能够表现该地蛮族接受中央管辖;湖广省在装饰框上绘出稻谷,两边各有一位在水田中耕种的农夫,可以对应该省“广阔的湖泊”“产粮宝地”的文字说明;云南省绘出大象和四位个头较矮的赤裸着上身的男子,能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地较为野性、且教化不足的状况。

^①周振鹤:《西洋古地图里的中国——记香港科技大学西洋古地图特藏》,《长水声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3页。郭亮:《十七世纪欧洲与晚明地图交流》,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78-199页。

文字说明的内容,“中国地理描述”作为前言部分首先说明“中国”的各类称呼、“中国”名称的来源,然后总述中国的地理位置、气候、土壤、行政区划、重要的物产、人口数量以及经济生活方式、文化艺术、科学宗教、河流山脉、朝代变更等,还对中国的计量和各省之间的距离加以说明;最后简要介绍了包括东部鞑靼、奴儿干、撒马尔罕、西番、老挝、安南等在内的部分周边地区或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发展、文化风俗、山川物产等。各分省部分开头总说该省的区域范围、地理面貌、行政区划、人口赋税、文化特点等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内容,然后分府(包括直隶州、军民府等)介绍各府(州)的地理位置、所辖州县、宗教风俗、物产建筑、河流山脉以及卫所等军事建制等。

附录部分的经纬度表,卫匡国共列出 1757 个地点的经纬度,详见表 3^①。这些地点主要即各省所辖府州县和卫所等各类行政建置所在。将它们和各省文字说明列出的府州县和卫所等地名仔细对照,可以发现经纬度表中列出的府(不包括军民府)所辖州县与文字说明列出的相关内容基本可以对应^②,但上述府所辖州县之外的地点,包括直隶州、军民府下辖州县以及卫所等,两者不同的情况较多,这当与卫匡国对明代军民府、直隶州以及卫所等行政建置不甚理解有关,相关内容后还会有所论及。

表 3 各省所列经纬度地点数量统计表

序号	省别 (地区)	文字说明中 府(除军民 府)所属州 县数量	附录列出经 纬度的府 (除军民 府)所属州 县数量	文字说明中 直隶州、军 民府、卫所 等数量	附录列出经 纬度的直隶 州、军民府、 卫所等数量	附录列出 经纬度地 点数量 总计
1	北直隶	131	131	17	16	147
2	山西	86	86	25	25	111
3	陕西	116	116	29	33	149
4	山东	104	104	13	15	119
5	河南	103	103	5	5	108
6	四川	97	97	69	69	166

①黄盛璋称经纬度数据达 1754 处(黄盛璋:《卫匡国〈中国新图志〉研究初论》,张西平等主编:《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卫匡国研究》,第 207 页),不过笔者统计的数据则为 1757 处。

②有三处存在不同,即广西省、云南省和辽东地区。广西省的不同在思明和镇安两府,云南省在广南一府,辽东地区则是将金州、复州、海州三卫归入府县。

续表

序号	省别 (地区)	文字说明中 府(除军民府) 所属州县数量	附录列出经 纬度的府 (除军民府) 所属州县数量	文字说明中 直隶州、军民府、 卫所等数量	附录列出经 纬度的直隶州、 军民府、卫所等数量	附录列出 经纬度地点数量 总计
7	湖广	112	112	21	21	133
8	江西	77	77	0	0	77
9	江南 (旧南京)	99	99	12	12	111
10	浙江	66	66	15	18	84
11	福建	53	53	16	16	69
12	广东	81	81	9	12	93
13	广西	93	101	15	8	109
14	贵州	75	75	37	37	112
15	云南	66	67	61	63	130
16	辽东	9	12	20	19	31
17	朝鲜	8(道)	8(道)	0	0	8
	合计	1376	1388	364	369	1757

三、《中国新地图集》的文献来源

卫匡国在《中国新地图集》序言中写道：“简短介绍过上述内容后,下面我会逐个描述每一个省,其中有我亲自游历过的(事实上我到过其中七个)^①,也有我从值得信赖的中国制图学家那里了解到的信息。事实上,他们一丝不苟地撰写了很多书籍,标注了所有城市、县、河流、山峰的名字和其它有用信息,还细致地注明了距离,但没有经度和纬度。因为我亲自对很多地区进行了测量,所以我在地图和那些被我视若珍宝般带回祖国的中国书籍

^①根据卫匡国在《中国新地图集》中的描述,他所到达的七省是浙江、江西、福建、南京、山东、广东、北京(Melis, Giorgio, “Martino Martini’s travels in China”, in Melis, Giorgio (ed.), *Martino Martini: Geografo, Cartografo, Storico, Teologo: 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Trento, 1983, pp. 421-444)。

的帮助下,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这方面的准确信息。”^①由此可知,卫匡国的中国地理知识来源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中国的相关文献,二是本人的亲自游历。当然还有来源于他人的信息,比如对于东北女真所在的东部靺鞨地区,他参考了中国的地理文献,同时他也指出:“这些由中国地理学家提供的简单信息还需要进一步的解释。虽然我本人从没亲眼见过这片土地,但我还是要本着努力和准确的态度,将我从中国地图中发掘到的、以及从与中国往来密切的靺鞨人那里听到的信息在这里做一些补充。”^②

卫匡国参考的中国书籍,其本人在其著述中并没有具体说明。他在广西省的说明文字中写自己在返回欧洲的路途上,“随身携带的五十多本汉语书籍陪伴我挺过了折磨人的晕船症状,熬过了无聊的漫漫航程”^③。这五十多本汉语书籍为何?卫匡国没有列出书目,具体情况不详。学界对其制作《中国新地图集》时参考的中国文献多有讨论,主要关注到《广舆记》和《广舆图》。白佐良译注时称查阅了13种古籍文献^④,指出其中一些卫匡国肯定也参考过,并在注释中有说:“卫匡国在编纂《中国新地图集》一书时很可能主要参阅了两部著作,分别是《大明一统志》和《广舆记》。”^⑤下面主要就《广舆记》《广舆图》和《大明一统志》做些说明。

(一)《广舆记》

明万历陆应阳(1542-1627)辑。根据卷前万历庚子(1600)吴郡申时行序,该书取裁《大明一统志》体例,并且“参以历代史官列省郡乘,删繁就简,举大遗细,而于名宦人物,尤多所考证”。全书24卷,依次为北直隶、山西、山东各一卷,南直隶、河南、陕西、浙江、江西、湖广、四川各两卷,福建、广东、

①Martini, Martino, *Novus Atlas Sinensis*, Bertuccioli, Giuliano (a cura di), Trento: Universit Degli Studi di Trento, 2002, pp296-297. 此本即白佐良意大利文译注本,后标以“意大利文译注本”。

②意大利文译注本,第278页。

③第十三省,广西省,第八府,太平(意大利文译注本,第778页)。

④按拼音序,13种古籍文献分别为:《大明一统志》(台联国风出版社1977年影印本)、《广舆记》(1600年版筑居藏板本)、《广舆考》(万历二十三年刻本)、《广舆图》(1566年,1579年版)、《广志绎》(1981年中华书局点校本)、《皇舆考》(《玄览堂丛书三集》本)、《皇明职方地图》(《玄览堂丛书三集》本)、《寰宇通志》(《玄览堂丛书续集》本)、《嘉庆重修一统志》(《四部丛刊续编》本)、《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三才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图书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钦定)续文献通考》(上海商务出版社1936年点校本)。

⑤第十五省,云南,注14(意大利文译注本,第860页)。

广西、云南、贵州、九边、外夷各一卷,各省内容大体包括建制沿革、兴盛、山川、土产、寺庙、名宦、人物等。卷首目录前除了申时行序文,还有凡例。清康熙时,蔡方炳(1626-1709)又有所增订,增订后的版本又有《增订广舆记》之名。

今可知的明本有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明阎光表(子仪)增定之凝香阁刻本(台湾大学图书馆、梵蒂冈宗座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有藏)、梟飞斋刻本(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遗经堂刻本(美国国会图书馆有藏)以及有冯时可序文的明刻清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有藏),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广舆记》明抄本,推测为明末启祯间写本^①。至于清蔡方炳之增订本,流传颇广,现存版本也较多^②。

早在19世纪,《广舆记》已经受到关注,被看作是卫匡国地图的重要中国文献来源。费赖之(Louis Aloys Pfister)在其作于1868-1875年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即言卫匡国之地图集“所本者疑是十七世纪初年之《广舆记》”^③。后方豪据此,又以“明末传教士所绘世界地图或中国图,无称《广舆图》者”而认为“亦可见匡国受《广舆记》影响之深”^④。之后包括莫东寅、张维华、许明龙等在内的不少学者论及于此也持这种观点,不过大多以费赖之记述为源。白佐良译注本则在文字说明注文中对许多具体内容与中国相关文献的描述进行了对比,可以看到,其中与《广舆记》内容相同的部分最多。

事实上,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也收藏着一部《广舆记》,该本为明代凝香阁刻本,前有黄汝亨(?-1626)序文,共8册24卷,曾于2015年在澳门科技大学展出部分复制图像,后图书馆将其全部高清扫描后,公布在网站上,可以

①海野一隆称其见读到5种:有申时行序文之万历二十八年(1600)本,刊年不明的凝香阁插辑本,梟飞斋藏板本,顺治十七年(1660)修改、有申时行序文的吴门五车楼藏板本,以及刊年不记的遗经堂藏板本([日]海野一隆:《地图文化史上的广舆图》,日本东洋文库,2010年,第193页)。

②[日]海野一隆:《地图文化史上的广舆图》,第195-196页。

③[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第265页。

④方豪:《徐霞客与西洋教士关系之探索》,《方豪文录》,北平上智编译馆,1948年,第93页。

看到其上有拉丁文的手写注记^①。伯希和(Paul Pelliot)在《梵蒂冈图书馆中文手稿与印刷品清单》中认为,这些手写注释正是卫匡国所作^②。由此,正如马西尼(Federico Masini)所言,“很显然卫匡国首先是以《广舆记》一书为参考的”^③,具体参照的版本就是这部收藏在梵蒂冈宗座图书馆的凝香阁刻本。

卫匡国在这部《广舆记》上留下的工作痕迹,包括对地图的剪贴,以及在地图和文字说明上的注记,尤其地图上的注记内容甚多。林宏对地图上所留下的手迹进行了颇为详细的分析,指出卫匡国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1. “经纬度参照网”的添绘;2. 部分特殊地点经纬度数字的标注;3. 根据《广舆记》文字内容在地图上增添部分晚明新设政区,并更改了部分统县政区的界线;4. 根据《广舆记》文字内容补注《广舆记》地图缺漏的府县;5. 对部分政区定点作出了小幅移动;6. 对“要塞”进行了识别和添绘;7. 部分中文地名边添写拉丁文拼音;8. 添改了包括长城、河流、湖泊和海岸线等在内的部分地物。这些手迹多数在卫匡国所绘制的地图上反映出来。地图之外,文字说明上也有部分注记^④。很明显,卫匡国绘制《中国新地图集》主要参考的就是这本《广舆记》。

(二)《广舆图》

《广舆图》是明代罗洪先(1504-1564)以元朱思本《舆地图》为基础,同时参考其他相关地图,以计里画方之法制作而成的地图集。该地图集初刻本共有地图48幅,除了17幅包括总图和分省图在内的政区图(其中有2幅陕西舆图),还有边防图(包括九边图在内)16幅,黄河图、海运图、漕运图等专题图8幅,邻国和周边地区图7幅。《广舆图》是中国第一部综合地图集,后有多次的补充翻刻,内容除了地图,还有统计图表和说明文字。现可见的

①林宏:《卫匡国〈中国新图志〉的绘制方式》,戴龙基、杨迅凌主编:《全球地图中的澳门》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55页。扫描本网址为:https://digi.vatlib.it/view/MSS_Barb_or.135。

②[意]马西尼:《第三卷引言》,张西平等主编:《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卫匡国研究》,第264页。[法]伯希和编,[日]高田时雄校订,郭可译:《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中华书局,2006年,第16页。

③[意]马西尼:《第三卷引言》,张西平等主编:《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卫匡国研究》,第264页。

④林宏:《卫匡国〈中国新图志〉制图方法研究》,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后出站报告,2018年。

《广舆图》版本有七:一是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前后的(疑)初刻本^①;二是明嘉靖三十四年(1558)南京十三道监察御史重刊本;三是明嘉靖四十年(1561)胡松刻本;四是明嘉靖四十年(1564)吴季源刻本;五是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韩君恩刻本;六是明万历七年(1579)钱岱刻本;七是清嘉庆四年(1799)章学濂刊本^②。

上述多种翻刻本的出现和流传,说明《广舆图》对后世地图的制作产生着相当大的影响。明代包括汪缝预编《广舆考》,吴学俨等《地图综要》,沈定之、吴国辅《今古舆地图》,陈祖授《皇明职方地图》,潘光祖《舆图备考》等在内的地图文献很大程度上都是根据《广舆图》而绘制的,《广舆记》部分版本中出现的地图也摹绘自《广舆图》。因此《广舆图》也被不少研究者视作为卫匡国制图参考的重要文献。早在1919年,巴德利(John F. Baddeley)在其《俄国·蒙古·中国》书中说卫匡国是依据1615年版《广舆图》而绘制,他提到《广舆图》有三个版本,1561年、1595年和1615年^③。他描述1595年版为两卷本,所以这一版应该是1566年韩君恩刻本,而所述的1615年本则实际上应该是万历本。之后福克斯(Walter Fuchs)、戴闻达、裴化行(Henri Bernard)等在他们的论著中都有推测卫匡国主要依据的是《广舆图》^④,但并不明确其所参照的版本,并且同时也指出部分内容两者存在差异。

需要指出,有些学者在肯定卫匡国主要参考《广舆图》的同时,否定《广舆记》是卫匡国参照的文献。其理由大约主要有二:一是《广舆记》中的地图

①今收录于《续修四库全书》之本为国家图书馆所藏影印本,其中《舆地总图》未绘出长城,当为此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58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11-528页)。

②任金城除了详述这七个版本,还指出邵懿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还载有一部明隆庆壬申(1572)建安杨氏遂初书房重刊本(任金城:《〈广舆图〉的学术价值及其不同的版本》,《文献》1991年第1期,第126-130页),但并未见到原书,《全国善本书总目》也未有著录。海野一隆列出的版本与任金城所述基本相同,另提到还存有稿本([日]海野一隆:《地图文化史上の广舆图》,第29-53页)。

③[英]巴德利(Baddeley, John F.)著,吴持哲、吴有刚译:《俄国·蒙古·中国》,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51页。

④Fuchs, Walter, *The "Mongol Atlas" of China by Chu Su-pen and the Kuang-yü-t'u*,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VIII, Peiping: Fu Jen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11. Duyvendak, J. J. L., *Early Chinese Studies in Holland,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32, Livr. 5 (1936), pp. 312-313. Bernard, Henri, *Les Sources Mongoles et Chinoises de L'Atlas Martini (1655)*, Monumenta Serica, vol. 12 (1947), pp. 127-144.

绘出经纬度,此最早为戴闻达所言,他说是查阅了清蔡方炳增订本所见^①;二是《广舆记》中没有收录户口等出现在《中国新地图集》的统计数字^②。很明显这两个理由都不能成立。第一个理由问题在于卫匡国所依据的并非明代《广舆记》的版本,而今所见《广舆记》明本和部分清本中的地图均无绘出经纬度,或戴闻达所见为其中较为特殊的版本^③。第二个理由则在逻辑上不甚合理,卫匡国在参阅《广舆记》的同时,完全可以参阅其他文献而说明户口等统计数字,如《广舆考》《皇舆考》等。

学者分析卫匡国参照过《广舆图》主要基于两方面的理由:一是包括户口、税收在内的统计数字多数和《广舆图》的记载可以对应,这从白佐良颇为详细的注文中也可以明显看到。然而这些数据与《广舆考》《皇舆考》《三才图会》《图书编》的数据也相同,因为这几部书的相关数据即依据《广舆图》而来。另外,还存在并不相符的数据,例如四川省的户口数和税收均不相符,江西省也是如此。所以以此为理由并不能明确是参照《广舆图》,还是《广舆考》《皇舆考》等著作。二从地图细部绘制的角度,如总图和分省图对四川省“马湖”的绘制,以及分省图将浙江省“象山”绘制成为岛屿的形式,均与《广舆图》的绘法类似^④。不过同样的问题是,《广舆考》《皇明职方地图》中的地图也都有类似的绘制,甚至《广舆记》对“象山”的绘制也与之类似^⑤。

荷兰海牙绘画艺术博物馆(Meermanno-Westreenianum Museum, Hague)收藏有1684年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 1622-1693)赠送给当时荷兰阿姆斯特丹市市长韦特森(Nicola Witsen)的一部《广舆图》,其中还保存着韦特森当年写的说明。从说明中的内容可知,卫匡国并未有参照该本《广舆图》,参照的是柏应理展现给市长的另一本地图集,该本尺寸小,不如赠送的《广舆图》精致,且上面有卫匡国的注记。这本地图集李孝聪推测

①Duyvendak, J. J. L., Early Chinese Studies in Holland,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32, Livr. 5(1936), p. 313.

②[日]海野一隆:《地图文化史上的广舆图》,第330-336页。

③林宏:《卫匡国〈中国新图志〉的绘制方式》,戴龙基、杨迅凌主编:《全球地图中的澳门》第二卷,第349页。

④覃影、李孝聪:《马湖考——对卫匡国〈中国新图志〉在东西地图文化交流史上贡献的再认识》,张西平等主编:《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卫匡国研究》,第235-239页。龚纓晏:《浙江象山:中国地图上的一处错误及其在欧洲地图上的反映》,张西平等主编:《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卫匡国研究》,第190-194页。

⑤“马湖”的绘制,《广舆记》与《广舆图》存在一些不同。

是万历七年(1579)钱岱刻本^①,但至今并未发现有卫匡国注记的《广舆图》。林宏通过参阅网上梵蒂冈藏本《广舆记》,认为这本尺寸较小的地图集正是今藏于梵蒂冈宗座图书馆的凝香阁本《广舆记》。因此卫匡国是否直接参考有《广舆图》尚无明确的结论。

(三)《大明一统志》

《大明一统志》为明代官修的全国性地理总志,成书于天顺五年(1461)。景泰年间(1450-1457),曾官修有《寰宇通志》,到英宗登基后,命李贤、彭时等补充修改而成《大明一统志》。该书共90卷,以明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为纲,府(州)为目,各府(州)下设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山川、土产、公署、学校、书院、宫室等20门,书末“外夷”各国,记述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地理形势。所载地图,除了正文开头的《大明一统地理之图》,各省开篇都有一幅该省的地理之图,绘制得颇为简略。

《大明一统志》后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重有增修,增改了部分嘉靖时期的建置变化等。到万历年间,又有重修,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万寿堂刻本即成书于1588-1620年间。相比天顺本,增入了大量天顺五年至万历年间的建置与人物,同时在大多府(州)的四至后,增加了税粮一项。《大明一统志》现存版本有多种,在此不做详述,但整体来看,不外乎这三类:一是天顺五年内府刻本及其翻刻本,二是嘉靖重修本,三是万历万寿堂刻本及其翻刻本^②。

白佐良在注文中认为卫匡国参考了《大明一统志》^③,并大量利用《大明一统志》的内容进行注释。多数情况下,白氏在利用《大明一统志》的同时,也标注出《广舆记》相关记载所在,也有没有标注出的情况。但是这些没有标注出《广舆记》的内容,凝香阁刻本《广舆记》中基本都有载。如山东省兖州府中,卫匡国述及孔子“出生在邹县”,又说到“盗泉”,孔子经此,“十分口渴,但也不愿意喝这里的水”,这两处注文都强调卫匡国参阅的是《大明一统

①李孝聪:《记16-18世纪中西方舆图传递二三事》,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跨越空间的文化 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470-472页。

②杜洪涛:《〈大明一统志〉的版本差异及其史料价值》,《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10期,第42-47页。

③第一省,北京或北直隶,注3、注4(意大利文译注本,第363页)。第二省,山西省,注6(意大利文译注本,第390页)。

志》^①,然而查这些内容在凝香阁刻本《广舆记》都有记^②。再如河南省南阳府中,卫匡国提到丹水,说“河里有一种只有在夏天才会显露出鲜红色的鱼……中国人充满想象力地写道,如果将脚浸泡到这种鱼的血中,就能轻松地行走于水面”^③。白佐良注文认为卫匡国在此参照的是《大明一统志》,并没有提及《广舆记》,可是同样的内容在凝香阁刻本《广舆记》中也有记^④。笔者核查卫匡国的相关记述,还未能发现出现在《大明一统志》,但在《广舆记》凝香阁刻本中无载的内容。所以白佐良认为卫匡国参考有《大明一统志》证据不足。

白佐良所依据的《大明一统志》是台湾台联国风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天顺五年的刻本,除此之外,他还参考了《嘉庆重修一统志》,以更进一步注释相关的内容。如前所论,卫匡国应该没有参照《大明一统志》。另外需要题外说明白佐良注释中涉及《大明一统志》的一些不甚确切之处,例如四川省重庆府下辖的州县有明代成化年间设置的安居、璧山两县,白佐良认为是卫匡国参阅《广舆记》1600年版的证明之一,因为《大明一统志》天顺版没有记述^⑤,然而实际上万历本《大明一统志》已增有这两县^⑥。又,云南省云南府共下辖13州县,白佐良注文中称这与《广舆记》相符,但《大明一统志》则多列出了杨林县^⑦,然杨林县在成化年间并入嵩明州,此《大明一统志》文渊阁本已有明确说明^⑧。补充说明,明代《广舆记》本身是依据《大明一统志》体裁,其文字内容亦有参照《大明一统志》相关内容而编纂,申时行序文中没有说明其所依据《大明一统志》的版本,后人也很少提及,对此我们可以明确明

①第四省,山东,注14、注15(意大利文译注本,第453-454页)。

②《广舆记》记曰:“盗泉,宁阳孔子渴而不饮。”(陆应阳辑,阎光表增订:《广舆记》卷五,第11页,梵蒂冈宗座图书馆藏凝香阁刻本)

③第五省,河南,注19(意大利文译注本,第478页)。

④“内乡抱朴子云:水有丹鱼,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鱼皆浮水,赤光如火,取其血涂足,可步行水上。”(陆应阳辑,阎光表增订:《广舆记》卷七,第13页,梵蒂冈宗座图书馆藏凝香阁刻本)

⑤第六省,四川,注26(意大利文译注本,第510页)([明]李贤、万安等纂修:《大明一统志》卷六九,明天顺五年内府刻本,《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史部207,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293页)。

⑥李贤等:《明一统志》卷六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231,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67页。

⑦第十五省,云南,注8(意大利文译注本,第858页)。

⑧李贤等:《明一统志》卷八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231,第801页。

代《广舆记》所依据的《大明一统志》是万历本系统,而非天顺本。

除了明确依据《广舆记》以及可能参考《广舆图》(或《广舆考》《皇舆考》等受其影响的作品)之外,卫匡国应该还有参阅过其他中国文献,尤其是其所记述的部分人口、税收的数据与上述三种著作有关的记述出入较大,如江西省和贵州省的相关数据。马雍认为这些数字或有参考部分地方志的可能^①;康言(Mario Cams)最近的研究则指出这部分数据当来源于曹君义的《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尤值得关注^②。另外,关于矿产分布,对照《大明一统志》的记载,不能相对应。马西尼说卫匡国的这部地图集编写于返回欧洲的途中,因此几乎不可能去查考卷帙浩繁的地方志。但是不能简单排除卫匡国所携带的书籍中存在部分地方省志的可能性。事实上,以上提及的内容比较分散,很难想象卫匡国没有相关文献的支持,这些资料源于何处有待于更为深入的细致考察。

中国书籍之外,卫匡国肯定也参考有西方文献,尤其是在地图的绘制上。典型的如总图西部所绘出的地区并不存在“Kia Lake”(加湖),这种绘制可以溯源百年之前的西文地图上,不过一般都标做“Khiamay 湖”,直到利玛窦中文世界地图,才简化称为“Kia 湖”^③。所以卫匡国对此的绘制和标注当依据利玛窦中文世界地图。同样参考利玛窦中文世界地图的部分还有西北部的“大流沙”^④。明显受到西方文献影响的内容应该还有对中国东南沿海海岸和岛屿的绘制和描述。西方大航海以来,许多西方船只来往于广东、福建、浙江的沿海一带,因此留下不少航海记录,他们对这些地区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也绘有相关地图。卫匡国对这三个省沿海海岸和岛屿的绘制,明显比其所依据《广舆记》中的地图来得准确和丰富,例如广东省图的珠江口,福建省图的厦门湾以及浙江省图的舟山群岛等^⑤,其中最为值得一提的就是对于台湾岛的绘制和描述。

①马雍:《近代欧洲汉学家的先驱马尔蒂尼》,《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第164-166页。

②Cams, Mario, “De Novus Atlas Sinensis(1655) van Martini en Blaeu en zijn Chinese bronnen”, *CaertThresoor* 38:4 (2019), pp. 3-17. “Displacing China: The Martini-Blaeu Novus Atlas Sinensis and the Late Renaissance Shift in Representations of East Asia”, *Renaissance Quarterly* 73(2020), pp. 953-990.

③[日]海野一隆:《西洋地图学史上のチアマイ湖》,原文发表于1985年,收录于海野一隆:《东西地图文化交涉史研究》,清文堂,2003年,第620-627页。

④[日]海野一隆:《东西地图文化交涉史研究》,第610-619页。

⑤林宏:《卫匡国〈中国新图志〉的绘制方式》,戴龙基、杨迅凌主编:《全球地图中的澳门》第二卷,第350页。

明代《广舆记》并没有绘制和描述台湾岛,对台湾的绘制直到康熙年间蔡方炳增订的《(增订)广舆记》才有补绘,也没有相关的文字描述。然而西方地图早在16世纪初开始对此就有绘出,早期以“小琉球(Lequeomaior 或 Lequeo minor 等)”之名,将台湾绘制成三个小岛,之后,有“小琉球”和“福尔摩沙(Formosa)”同时标注的情况,这是受到中国文献记载的一些影响。到17世纪初荷兰人占据台湾,开始实际的地理测绘,地图中的台湾逐渐符合实际的情况被绘制成为大岛,并标注为“I. Formosa”。在布劳1635年出版的地图集的中国地图还以巴尔布达地图为蓝本,但已将台湾绘制成为一个完整的大岛。卫匡国地图中的台湾反映的是西方这一时期地图绘制的成果,总图中的台湾岛当根据之前布劳地图集中的中国总图绘制,不过相比更为准确。除此之外,福建省图中,台湾岛的西北部分绘在图的右下角,最北部绘在北纬25度处。岛上有标明“I. Formosa, incolis PEKAN, SinisLieukieu”,即“福尔摩沙,当地人称北港,中文为琉球”。此处“北港(Pekan)”名称源自当地人之称呼,在17世纪初荷兰人的地图上也常有出现^①。卫匡国同时也具体描述了该岛的命名和风俗习惯等。所以就台湾岛这一地区而言,在中国文献不足的情况下,卫匡国无疑是主要依据西方相关资料,来进行具体绘制和描述的。

四、卫匡国的中国地理认知及其影响

蒙元之前,西方人对所谓“远东地区”的地理认识主要来源于传说和传闻,基本上局限在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 公元90-168)时代,多数时间说的是赛里斯人(Seres)、秦尼国(Thin)、北方的赛里斯与南方的秦奈国(Sinai)、秦尼扎(Tzinitza)和秦尼斯达(Tzinista)、桃花石(Taugaste)等这些不同的称呼。在15世纪以后重绘的托勒密世界地图上,东亚混沌一片,用文字表示的一般只是Seres、Sinae和Scythia Extra(外斯基泰)。蒙元以来,随着使者、旅游者、传教士和商人不断到访东方,西方人的中国地理认识逐步扩大。整体来看,在卫匡国之前大体经历有两个阶段,一是受到如柏朗嘉宾(Jean Plano Carpini)《蒙古行纪》、鲁布鲁克(William Rubruquis)《东行纪》、海屯(Hayton)《海屯行纪》以及《马可·波罗行纪》等早期行纪作品的影响;二是受到西方大航海以来,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使者和商人等撰写的中国方面著述的影响,其中包括以利玛窦(Mattio Ricci)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的相关著述。

上述第一个阶段可以《马可·波罗行纪》为标志,该书是欧洲人撰写的

^①陈宗仁:《“北港”与“Pacan”地名考释:兼论十六、七世纪之际台湾西南海域贸易情势的变迁》,《汉学研究》第21卷第2期,第249-278页。

第一部详尽描绘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游记,在13世纪末问世以后,流传甚广,很长时间影响着西方人对远东的认知。反映在地图上,1375年绘制的《卡塔兰地图》(*The Catalan Atlas*)突破了托勒密地图的框架,已经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主要内容来展示一个新的世界地理面貌,标绘出许多马可波罗记述的地名,改变了西方人对中亚和更远的亚洲以及部分印度的地理认识。在中国部分,这幅地图标绘出 Cansay,即 Quinsay(行在,即杭州)的另一种写法,还绘出一幅忽必烈的肖像。之后的相关地图,可以看到更多与中国有关的地名,包括 CATHAY(契丹)、Quinsai、TANGVT、MANGI(蛮子)等。马可波罗游记影响下的中国地理认识一直延伸到进入16世纪中期,同类的地图作品层出不穷^①。

第二阶段则可以大航海之后收录在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地球大观》1584年拉丁文版的《中国新图》为标志,该图一般被认为是葡萄牙耶稣会士巴尔布达(Luiz Jorge de Barbuda)的作品,也是欧洲人所制作的第一幅刊印传世的单幅中国地图。此外还有利玛窦汉文世界地图及其中国札记、罗明坚的中国地图集手稿等。该阶段西方人对中国地理的认识不再局限在一些不甚明确的地名,《中国新图》以及受其影响而制作的中国地图已呈现出中国的图形,标绘出明代两京十三省以及少量的府州县名,也明显绘制出长城^②;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更是比较好地标绘出黄河、长江以及珠江等水系,华山、嵩山、恒山等山脉,同时确定了中国所处的经纬度范围以及部分城市的经纬度;罗明坚的中国地图集手稿则制作有分省图。总体看来,这一阶段西方人对中国地理的认识走向现实化和具体化。

尽管如此,到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出版之前,西方对中国地理仍存在不少模糊乃至错误的认知。虽然巴尔布达地图正式刊印后影响甚广,但是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直到17世纪初依然存在。表现在地图上,很多情况下出现长城以北用马可波罗的地名,长城以南用巴尔布达的地名,形成黄时鉴师所称的“北马南巴,马巴并存”的格局^③。典型的如奥特里乌斯《地球大

①黄时鉴:《马可波罗游记与西方古地图上的杭州》,中国元史研究会、杭州文史研究会编:《马可波罗游历过的城市:元代杭州研究文集》,杭州出版社,2012年,第1-19页。
黄时鉴:《忽必烈:最早绘在西方古地图上的中国皇帝图像》,许全胜、刘震编:《内陆欧亚历史语言论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48-455页。

②黄时鉴:《巴尔布达〈中国新图〉的刊本、图形和内容》,《黄时鉴文集三:东海西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260-272页。

③黄时鉴:《马可波罗游记与西方古地图上的杭州》,中国元史研究会、杭州文史研究会编:《马可波罗游历过的城市:元代杭州研究文集》,第16页。

观》虽然收入巴尔布达中国地图,但在他的世界地图上,China 的长城以北标出了马可波罗的 Cathaya(契丹)、Cambalu(汗八里)和其他一些地名。又,布劳家族在 1606 年出版的世界地图上已经基本上采用了巴尔布达中国地图的图形和内容,并画出了长城,但同时其世界地图也和奥特里乌斯在世界地图上的表现一样。他的这种做法后来人保持在 1630-1662 年不断刊印的《新地图集》的世界地图上,以及在 1617 年始刊的“亚洲地图”和 1635 年始刊的“中国地图”上。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西方人逐渐清晰认识中国历史和地理过程中所存在的模糊和局限。

这种局限直到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的出现才终于得到改观。前已谈及,这部地图集不少内容直接参考《广舆记》等中文文献资料,卫匡国一方面对相关内容采用西方制图法重新加以编绘和说明,另一方面也融合了西方人大航海以来的地理发现和自己在一些地区的实地考察,并加以分析。除了中国总图和对中国地理状况的整体描述,还制作分省图,对每个省加以说明,内容比较具体客观,反映出他对中国地理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当然作为一个留居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其认识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和错误。然而综合包括地图和图志在内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到,卫匡国纠正了之前西方人不少模糊和错误的认识,不仅较好把握中国作为一个地理单元整体所具有的特征,而且也具体化中国内部不同区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特点。

卫匡国在序言中首先明确指出,无论是 Catay(契丹),还是 Mangin(蛮子),所指代的都是居住在中国的居民,并强调“Sinae 或 China”当来源于 Cin(秦),厘清之前欧洲人因为这些不同名称导致的对中国的模糊认识。这是西方首次表达对“Sinae 或 China”来源的清晰认识,之后这一观点也基本被大家所接受。早前利玛窦尽管已经认识到马可波罗所称的“Catatio(契丹)”就是中国,也就是托勒密时代的“Sina”以及传说中的“Serica”^①,但是对“Mangin”却未加以说明。实际上,正如前所述及,受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很长时间,西方人不能确定汗八里、行在、契丹和蛮子究竟指向哪里,地图上的表示因此也是模糊不清的。

卫匡国解释“Mangin”之意说,“由于在当地语言中,Mangin 的意思是野蛮未开化的人,是对汉人的蔑称”^②;他同时指出欧洲地图上的其中一个严重错误,“就是认为在中国之外还存在另一个广阔的国度,就是契丹,其中包括行在和汗八里等府,而且还认为在长城以北,什么都不存在,没有可以定居

①[意]利玛窦著,文铮译:《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5 页。

②意大利文译注本,第 232 页。

的城镇”^①。至于“Quinsai”，卫匡国在浙江省杭州府一开始的说明中，就写到：“马可·波罗在他的书中提到了一个名为‘Quinsai’的城市，欧洲的地理学家们一直在徒劳地寻找它的确切位置，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我也就此说上两句，相信就连他们的天文学著作也是完全想象不到的……我有不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杭州就是马可·波罗笔下的‘Quinsai’。”^②然后又从具体里程、发音和历史来进一步证实该论断。正是卫匡国地图集之后，“Quinsai”这一不确定的地名，在西方人所制作的中国地图中才终于逐渐消失。

关于对中国的整体认识。首先，卫匡国对中国地理范围的认识虽然基本还是局限在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范围，但是也意识到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在序言中，所谓“远方亚洲”更多指的就是“中国”，其地理范围，东部边界是东海；北部与“古老的鞑靼族相邻”，部分以长城、沙漠为界；西部和南部与西藏、交趾、老挝、缅甸等接壤。卫匡国颇强调中国四周存在的天然屏障，北部的沙漠，南部、东部的海洋，以及西部的昆仑山脉（Damasii），以此说明其所具有的较为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并尤为惊叹其范围之大，横跨30度经度，纬度的幅度也有24度。上述的范围，明显并没有完全局限在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的范围。从总图上看，西部黄河流域的上游地区和东北辽东地区都在卫匡国所认为的“中国”疆域范围内。不仅如此，卫匡国扩大介绍明代中国周边的一些地区，也可见他充分认识到这些地区与明代中国关系的紧密。

从政区的角度，上述认识也较明显。各省的说明文字中，卫匡国除了详细列出各府（州）所辖州县，还在最后都列出部分重要的要塞，这些要塞主要就是明代设置在边疆地区的实土卫所、宣慰司等。明代高层政区三司分立，一个显著特点是除了布政使司及下辖的府州县是正式的地方行政区划，即所谓“两京十三布政使司”，都司卫所也有行政区划的意义，尤其是实土、准实土的都司、行都司、卫、所方面更为突出，在边疆地区这些颇具特色的非正式政区承担着实际控制和管理地方的各项行政职责。卫匡国看起来不了解三司分立之具体情形，但是显然知道这些所谓“要塞”所具有的军事和行政职责。除了在全省说明文字最后列出，还在地图上以专门的图例部分标绘以表现之。

当然卫匡国对于明代地方行政区划认识也存在不足，比较明显的有三处。其一，关于“要塞”，卫匡国对于卫所以及边疆地区宣慰司、长官司等未予以名称上的区别，均采用“*forteza*”一词，由此看来，他虽然了解这些建置和军事有关，但似并不清楚它们在行政管理上有所差异。如贵州省府、军民府下辖的要塞实为长官司，而附在之后的要塞则为卫所，不过地图集均以

^①意大利文译注本，第237-238页。

^②第十省，浙江，第一府，杭州（意大利文译注本，第640页）。

“fortezza”标识;云南省除了长官司,各宣慰司和宣抚司也均以“fortezza”说明。也正因如此,卫匡国列出的只是一部分卫所、长官司等,尤其是卫所,多数属实土卫所性质。前述经纬度列表和正文中的这部分地名不完全对应当与此有关。其二,府下辖州县中,府治所在地直接以府名表现,没有列出其附郭县,这主要是受到其所参考的《广舆记》的影响。其三,对于巡抚和总督职,卫匡国应该不了解它们之间的不同,因此也未有区别说明,而均用“viceré”说明^①。

其次,卫匡国较好地展现出“中国”作为一个地理单元整体所具有的自然和文化特征。在自然地理方面,他在序言中特别介绍长江和黄河,强调它们分别是亚洲地区的第一大和第二大河流,贯穿“中国”东西。他将长江看作是“中国”南北的分界,指出它流经不同的地区时有不同的称呼;对于黄河,则更多说明它对“中国”所带来的灾害,这或和他的一些亲历有关。除了序言中的总述,卫匡国还在两条河流所经由的省府中加以说明,如河南省开封府中,他这样写道:“开封距离经其南边(当为北边)流过的黄河约两里格远,位于与其东、南、西三面相邻的黄河支流汴河附近的低地上。汴河的河床略高于开封,因此这里用方形石块建造了超过三百里长的坚固河堤,以阻挡河水,让城市远离洪水的危险。”^②进一步说明它们对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影响。

在文化地理方面,卫匡国则关注到长城、城市、宗教、习俗等多个方面。关于长城,卫匡国之前虽然已有不少西方人加以说明,但是他更为详细地说明长城的建筑特点和其贯穿的地区。城市,包括都城、府城,乃至县城,卫匡国意识到它们虽然存在规模的大小,但城墙、城门、鼓楼、文庙等这些建筑具有共同的特征。宗教习俗方面,卫匡国特别解释了中国儒、释、道三教的特点,他分别以儒家教派、迷信教派和享乐主义教派释之,并充分肯定儒教所具有的道德精神,他说:“这一教派认为人必须注重道德的培养,不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做任何事都要以爱为本,不应算计或有其它目的,积德行善更不是为了得到某种奖赏。道德至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能与之相比。”^③也正是这样的认识,作为传教士的卫匡国积极推进其前辈利玛窦的适应性传教政策,为“礼仪之争”加以辩护,促进中西方文化的相互理解和认识。

至于中国内部不同地区的地理认识,卫匡国通过分省图和说明文字表现出各省各府所具有的地方特点。在分省图上,不仅绘制出重要的河流和

①中文译稿已根据具体情况而分别明确翻译成“总督”和“巡抚”。

②第五省,河南,第一府,开封(意大利文译注本,第461页)。

③序言(意大利文译注本,第249页)。

山脉,还特别绘出矿产之分布;在说明文字中,首先介绍各省地理范围、自然地理特点、行政区划的情况以及人口、赋税等,然后再分别介绍各府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多数情况下,介绍该地重要的山川、祠庙、建筑、和特产等,更进一步展现出不同区域的地方特色。例如浙江省,卫匡国特别强调其作为丝绸产地的存在,在分府描述中,杭州风景的秀美,嘉兴、湖州商业经济的繁荣,金华、衢州道教文化的盛行,宁波、台州、温州沿海地区的特色,等等都有一定的展现。这些区域性的地理特点在他之前的西方人较少关注和说明。在地图上,各省所具有的区域特点较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前述分省图图名装饰框所绘制的图案。

早在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出版之前,罗明坚(Ruggieri, Michele)有编绘《中国地图集》(*Atlantedella Cina*),与卫匡国同时期的卜弥格(Boym, Michael)也有《中国地图册》(*Atlas ImperiiSinarum*),不过因为两著均未出版,对西方人中国地理认知的影响十分有限。17世纪到18世纪是欧洲大航海之后“中国热”出现、并逐步发展成为高潮的时代,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作为西方地图绘制史上出版的首部用近代制图方法编绘的较为符合当时中国实情的分省地图集,1655年以拉丁文初版后,之后又以其他多种文字出版,因此影响十分广泛,成为西方人中国地理认知里程碑的作品。在此之后出版的亚洲地图中的“中国”部分绝大多数参照卫匡国地图集“中国总图”的框架绘制,直到1735年法国地理学家唐维尔(J. B. Bourguignon d'Anville)以《皇舆全览图》为基础编绘的《中国、鞑靼与西藏新地图集》(*Nouvelle Atlas de la China, de la Tartars Chinois et du Thibet*)被收录在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中华帝国全志》中出版,尤其是该地图集在1737年盗版单独结集出版后,卫匡国地图集“中国总图”的影响才逐渐式微。然而因为唐维尔地图集并没有地志的内容,再加上《中华帝国全志》不如卫匡国地图集的传播广泛,因此在中国分省地理认知上,直到19世纪初,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依然持续产生影响力。

感谢上海师范大学林宏博士提供部分文献线索以及修改建议,感谢东北师范大学王永杰博士的修改建议,感谢浙江大学张刚峰副教授在部分意大利文资料翻译上的帮助和修改建议,感谢法国科学院-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CNRS-EHESS)中日韩研究中心Dorofeeva-Lichtmann Vera研究员、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Cathleen Paethe馆员以及德国罗滕鲍姆艺术和文化博物馆(MARKK)Diana Lange研究员在文献资料以及文字认读等方面予以的帮助。

【作者简介】杨雨蕾,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中外关系史和地图学史。



《中国新地图集》北直隶（北京）图
 详参杨雨蕾《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考论》一文



《中国新地图集》南京（江南）图
 详参杨雨蕾《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考论》一文